

文章编号: 1000-8934(2017)10-0074-06

DOI:10.19484/j.cnki.1000-8934.2017.10.014

末路演进和文化修复:论生态批评的资本转向

谌晓明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1620)

摘要: 作为两次概念抽象化的结果,人类纪话语无法克服其本质上自我解构的人类中心主义、例外主义和至上主义逻辑困境。将当前的生态纪元正名为“资本纪”可以更好地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欺骗性和破坏性,为生态问题的症结找寻答案。资本纪话语探求资本主义末路演进的规律,分析生产关系在环境生成过程中的显性和隐性作用,借此改变由强权资本杜撰的生态历史。在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资本纪话语希望通过文化修复来缩小资本主义和环境危机之间的裂隙,达成从危机向持续发展的理性过渡,从而实现共同栖居的生态理想。

关键词: 资本转向; 资本纪; 末路演进; 文化修复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人类纪话语讨巧人心,自诞生以来赚足了媒介的眼球。然而近年来,学界对其讨伐声音渐强,认为它在话语内核、立场和表述上稍欠妥当,无法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在众多的替代名称中,资本纪脱颖而出。它直指人类纪话语所忽略的生产关系核心,摆脱了其两次抽象化的话语困境。本文将从人类纪研究面临的问题入手,通过对笛卡尔人类/自然二元论、马克思关于资本生态的论述和拉图尔共同栖居理论的梳理,分析资本纪的理论沿革、历史生成和文化导向等问题,为建构资本纪的批评话语体系打好基础。

一、人类纪的话语困境

1. 话语内核之谬:抽象的、非历史的人类性

人类纪话语的诞生是“两次抽象化”的结果:其一是在发展问题上,发达国家以自我为中心,抽象化地代表了整个“人类”;其二是在责任问题上,资本主义霸占话语权,将自己抽象化为整个人类圈的化身。第一个抽象化以发展程度为标准,认为世界经济发展让地球生态处于危险的边缘,希望人类整体进入速冻期,这一逻辑的结果就是欧美继续保持高排放,而剥夺亚非拉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权。第二

个抽象化更具有欺骗性,它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族群整体上,而忽略了资本主义在这场环境灾难中的主导责任。将当前的生态纪元正名为“资本纪”可以更好地揭露其生产方式的破坏性和欺骗性,实现真正的对症下药。

而对于其核心概念“人类”,人类纪话语忽视了“人类性”的历史分析视角,相关文献常常将其指向“人类事业”的笼统说法。按照概念设计者的初衷,作为全新世的继承者,人类纪的标志起点是人类活动造成大气中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并且认为这背后的驱动力就是煤炭和蒸汽,是不分彼此的“人类事业”整体,而不是资本与日益分化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不是帝国主义及其殖民地奴役文化。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人性观认为,在权力和生产的相互影响下,人性是内在分化和不断演变的。人类纪用“内在的、麻木的综合性把众多个体自然地联成一体”⁽¹⁾⁴²³,这种说法势必使人类成为一个抽象的、“大一统”的指称单位。宽言之,这是人类纪逻辑失范,无意中成了资本主义的帮凶;审言之,这是其掩盖生态不公,刻意让全人类为资本主义买单。

2. 话语立场之谬:人类中心主义、至上主义和例外主义

从话语立场上看,人类纪所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至上主义和例外主义倾向不利于人类的自我反

收稿日期:2017-04-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福克纳作品研究”(14YJA752001)。

作者简介:谌晓明(1971—),湖北随州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生态文化、数字人文与福克纳研究。

思和自我批判。在人类纪的话语体系中,人类时常被描述成时代的普罗米修斯,在“非人类”面前显得聪明灵巧,时常以胜利者的姿态自居,这种沾沾自喜不仅体现在地理空间和地质时间上,还大量出现在各类历史文献中。人类纪的历史就是一部自我夸耀史,人类利用自己的智力和灵巧推动技术的进步,对地球的每一寸空间施加着影响。在短短几千年里,人类就造成了其他地质时代几十万年才能完成的自然变化。“我们在利用能源和操控环境方面如此得心应手,正在成为地球上地质进程的一个决定性力量。”⁽²⁾²²²⁸基于这一逻辑,“人类”想当然地成为这一世代的命名指标。

在资本纪的倡导者看来,这种简单地用人类自身来命名地质年代的做法是人类中心主义和例外主义在作祟。哈拉维对人类纪话语所体现出的人类例外主义思想表示了担忧,她罗列了人类纪逻辑上的“七宗罪”,⁽³⁾⁵²认为人类纪的逻辑基础是把同质的人类作为地球生态变化的驱动因素,本能地将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让人类以一种“不依附于物种间时空网络依存关系”的例外身份存在。⁽⁴⁾¹¹今天看来,这种例外主义的肥皂泡早已被四支历史梭镖(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论和日益加深的环境危机)所刺破,成为人类自尊大的历史幻影。

3. 话语表述之谬:自我解构的话语框架

人类纪的命名方式是人类基于自己的物种名称来展开的,这种设计理念虽博得了族群在心理上的快速共鸣,但它自诞生起就是一个松散的、自我解构的话语组合。说它是话语组合,是因为它更像是地质学、生态学、政治学等学科拧在一起的多股绳,其成分不尽相同,且相互交叠混杂。大凡涉及与各自学科相关的环境问题时,研究者通常是竞相对着“人类”这个抽象概念泼脏水。一定程度上讲,人类纪的命名方式与《瓦尔登湖》中“弗林特湖”的来源如出一辙:当农夫弗林特毫不避讳地给无名湖命名的时候,梭罗不无感慨地写道“我们的命名术语是如此贫乏!这个不洁而愚蠢的农夫哪有资格赋予名于它?他这个吝啬鬼更中意的是闪闪发亮的美元或美分。”⁽⁵⁾¹⁵⁸如同“弗林特湖”一样,“人类纪”除了标榜自我和现身说法的勇气之外,既无深刻的经验或道德蕴含,又无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

在人类纪话语中,“人类”既置身事外(环境问题的评判者),又置身事内(环境破坏的主导者),欲

两全而不得其美。科恩指出,人类纪这个术语“沉闷而招摇”,彰显着自我神性和星球主宰者的窃喜心态,是“人神同性论的典型缩影”。⁽⁶⁾²³⁹在人类纪的大旗下,资本富豪在通过操纵媒体政治来瓜分气候变化和地质工程“红利”的同时,任由生态强权与生态毁灭肆意蔓延。人类纪所兜售的人类整体概念剥夺了欠发达群体的发展权力,成为欧洲中心主义、种族和性别歧视的生动注脚。人类纪逻辑下的“人类”集神圣与诅咒于一身,成了乔治·阿甘本所言的 *Homo Sacer*(神圣/诅咒之人)⁽⁷⁾⁷²。很显然,人类纪的命名困境使得人类纪的立论初衷与其概念逻辑相互消解,削弱了其话语的权威和效果。

二、资本纪历史:生态二元论、廉价自然和末路演进

在人类纪的替代概念中,“资本纪”是近年里最强的声音之一。近10年来,在摩尔、马尔姆与哈拉维的推动下,相关著述接连出版,在学界影响日显。2016年,摩尔主编的《人类纪还是资本纪——自然、历史和资本主义危机》一书正式将资本纪与人类纪的论争推向前台,指出当前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抽象的人类整体。对此,克拉克等人类纪研究者辩驳称:生态问题古今皆有,蒸汽机发明之后尤盛,意识形态和生产方式未必是生态灾难的主因。⁽⁸⁾²而资本纪认为,人类纪将环境问题技术化和人性抽象化,掩盖了资本主义的生态掠夺性和破坏性本质。与封建社会的地租盈利模式和社会主义的理性供需模式不同,危机和破坏是资本主义的生存方式,无限盘剥的生产方式和无序竞争的市场模式使其像上紧发条的资源消耗机,不断制造着新的生态危机。

1. 人类/自然二元论

对人类/自然二元论的解构是资本纪历史生成的逻辑起点。摩尔认为,人类纪话语具有明显的“哲学上的整体论和实践上的二元论”特征,即在把不同阶层的人类笼统地归为生态责任主体的同时,又将整体的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这种人类/自然二元论是笛卡尔身心二元划分的翻版,是17世纪物质/意识对立论在21世纪生态话语上的再现。毋庸置疑,地理大发现不仅激励了西方世界征服自然的雄心壮志,也为二元论提供了不少的现实依

据。然而对于人类纪这一生态前沿话语来说,将成分混杂的“人类”和“自然”置于二元对立的框架下,其“人类+生态变化=人类纪”的话语模式具有明显的逻辑谬误。恰如齐泽克所言,人类纪视域下的气候变化只是掩盖国际资本主义深层次问题的一个“假问题”,⁽⁹⁾³³⁴在其表象之下的是“人类”和“自然”的成分分化问题。伴随着劳动力无产阶级化和土地私有化的同时,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因其依附的象征和实体关系开始变得更为复杂。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倾向于将所有对象物单元化、数字化和商品化,正如奴隶在出售的时候的等级划分那样。⁽¹⁰⁾⁴¹在此分类思维下,“人类”的概念开始分化,有些成为“大写”的人,属于“文明社会”的一分子;⁽¹¹⁾¹⁴有些则被排除在外,成为部分的、被交易的或被剥削的“自然”的一部分。

资本纪的动态“自然”模式取代了僵化的人类纪二元划分,这种对二元论的解构产生了两大逻辑结果。首先,它将生产关系融入生态视角,改变了人类和自然分庭抗礼的局面,将人类和自然定义为双重内在的共生关系。技术对改善生态固然重要,但资本主义对“人类”和“自然”族群的分化才是环境问题的根本。再者,它将政治历史纳入生态时空,改变了依附在二元论上的世代划分观。由于不认可生态问题的政治历史性,人类纪将其起始时间确定在瓦特发明蒸汽机的1784年⁽¹²⁾²⁰⁵,并将每一次的技术革新看作生态变化的重要节点。而资本纪话语反对技术决定主义和欧美中心主义的观点,建议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纳入考察范围。

2. 廉价自然

价值法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生存的根基和空气”⁽¹³⁾²⁰⁵,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资本主义自诞生起便尽力获取廉价或免费的生产要素,即摩尔所说的基于四大“廉价”(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廉价能源和廉价食品)的廉价自然。首先,劳动力作为可以移动的、智慧的“自然力”,是资本家赚取利润不可或缺的人力因素。在原始积累阶段,资本家为了获取廉价劳动力不择手段:如贩卖非洲黑人奴隶、大量引进廉价的合约苦力、尽力压低工人工资等。再者,对廉价原材料和廉价能源的索取不仅贯穿着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球的生态面貌。从发现新大陆开始,在坚船利炮的恐吓和攻击下,西方列强竞相瓜分世界,对于资源和能源更是巧取豪夺。即使在欧洲,

由于乱砍滥伐,18世纪的波罗的海沿岸几乎呈现出“不见一木”的荒凉景象。⁽³⁾¹¹⁹食品对于廉价劳动力的保障也至关重要,通过农业技术革新,历史上英国、荷兰和美国在保障廉价食品供应上都用尽心机。

基于廉价自然的资本盈利模式和掠夺逻辑深刻地影响着资本纪的生态观。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资本家一方面尽量压低工人工资,减少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费尽心机从自然界获取廉价原材料、能源和食品,以获取更多的无酬自然和“生态剩余价值”。⁽¹⁴⁾¹²⁵不过,随着无产阶级的觉醒和技术革新手段的减少,廉价的自然组织方式日渐枯竭,资本纪正走向死亡绝境。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¹⁵⁾²²⁴,世代盘剥造成的工人贫困和自然枯竭让资本主义日渐成为无源之水。以化石燃料为支撑的历次工业革命都是“负价值”的积累,大量污染物排放堆积在地球空间,它们与奴隶贸易一样是资本主义生产逻辑所无法克服的原罪。所以说,基于廉价自然的资本主义环境史就是一部通过星球灾难主义的概念体系来生成灭绝的历史,它的存在势必将生态灭绝的趋势转化为永久特性。

3. 末路演进

生态问题让整个生态圈都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威胁,探寻资本末路演进的规律可以为拯救蓝色星球提供最后的一丝希望。人类纪话语倾向于将影响更多地归咎于“技术”因素,即技术决定论。他们将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归纳为三种复杂等级:简单工具关系、社会技术关系和不可预料的复杂衍生关系,认为技术进步在革新现代生活的同时,也有失控的风险,解决生态问题应该从技术的管控开始。⁽¹⁶⁾³⁸

而资本纪认为,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人的问题,技术只是环境问题的手段。人类纪的非政治性技术话语正好落入了资本主义的圈套,因为技术发明史恰好“给资本家提供了镇压工人阶级反抗的武器”⁽¹³⁾⁵⁶³。要想根本性地扭转生态局面,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人的异化问题。异化劳动现象是资本破坏性在人性上的集中体现,它使得劳动者抽象自然化,是人与自然二元论在人性之间的再现。如本雅明所言“在荷马时代,曾是奥林匹亚众神灵关照对象的人类,如今只能独自思考了。人类自身的异化,已经令他所经历的毁灭达到第一级

的审美程度了。”⁽¹⁷⁾²⁴²

事实上,关注末路演进的资本纪话语与本雅明的悲观思想近似。唐娜·哈拉维是资本纪概念的强力支持者。她借用“克苏鲁派模蛛”创造出“地狱纪”一词,希望用这个“来自深不可测的狂暴之地的居民”来影射资本纪的生态状况。她认为,资本主义就像一张共创死亡的蛛网,相互交织勾连,协作诱捕自然中的弱者,而在关键节点等待的正是制造生态危机的资本毒蛛⁽³⁾³⁴。

同样地,迈克布莱恩将资本纪的死亡进程归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发现新大陆开始,印第安人、非洲黑奴和原始生态的悲惨命运标志着灭绝的开端。第二阶段是自资本主义建立到二战之前,资本主义将技术、能源开采等要素与其生产方式绑定,资本积累和物种灭绝呈现出共同演进关系。第三阶段指的是二战后的生态灭绝加剧,尤其是核竞争带来的生态恶果,促使金融、军事和环境风险在生态主题上加速融合。第四阶段为新自由主义引起的生态问题临界失控,灾难虚无主义和死亡纪的迫近让生态安全的前景日渐晦暗⁽³⁾¹¹⁹。

与哈拉维和迈克布莱恩不同的是,斯蒂格勒则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末代资本主义的关爱问题上。他提倡将第三记忆与资本主义的第三局限相结合,分析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和关爱同步化。第一局限产生在19世纪末,工业革命的红利行将结束,贫富差距拉大,资本主义收益下降。为对抗这一局面,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大兴消费之风。这种做法在20世纪末再次失灵,资本世界日益成为一个胃口尽失的巨婴。

而第三局限就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生态局限,它不但指的是化石燃料的渐趋枯竭,而且是对一切事物的耗损和破坏,包括心理层面和集体层面的欲望和关爱。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遵从互联网空间规则的网络个体实现了精神和集体上的新的个人化,这种属于第三记忆的人际关系跨个人化给资本主义的第三局限带来了希望。当然,跨个人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对生产/消费二元经济既具有诊疗效果,但也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的分化。基于这一倾向,斯蒂格勒建议用“知识生态政治”来关爱新经济时代网络个体,以“抵消和克服生态末世的致命逻辑”⁽¹⁸⁾¹⁰²。

三、资本纪文化:文化修复和共同栖居

在近四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文化作为政治和经济的协作手段见证了资本纪的兴衰起伏。在面临第六次生态大灭绝的当下,资本纪话语希望通过文化修复的举措来缩小资本主义和环境危机之间的裂隙,以期实现共同栖居的理想。

1. 文化修复

丹尼尔·贝尔认为,经济和宗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两个重要的制衡力量。进入20世纪,伴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宗教神学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开始瓦解,资本主义文化逐渐走向思想上的天马行空和物质上的放浪形骸⁽¹⁹⁾¹³,前者以艺术流派的频繁更迭为代表,后者以文化工业为代表。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地球生态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本纪文化所崇尚的自由思想和中产崇拜理念开始退潮,与自然相联系的各种文化观念走向前台。人们尝试在文化领域修复资本造成的人与自然间的巨大裂缝,为解决人的抽象自然化奠定基础。

以斯佩思为代表的环境文化学者认为文化修复是对政治、经济和科技措施的重要补充,主张用提高生态意识的方法来解决生态问题。在他看来,环境危机其实是一种“精神危机”,当前需要的是“人心的转变”与一场“价值观和意识的革命”⁽²⁰⁾²⁰⁰。斯佩思从文学、社会运动、宗教和教育四个方面阐述了生态意识转型的举措。首先,综合利用各种媒体方式来创立生态话语和生态叙事的氛围,将多角度、差异化的目光聚焦到生态问题上。第二,他主张发动一场对抗生态问题的民间行动。第三,将环保意识的提高与宗教传习相结合,发挥宗教对人的意识引领作用。第四,充分利用教育渠道,让尽可能多的人接受到环境意识教育。

另一方面,文化唯物主义者主张从历史脉络和变化关系着手,推翻不平等的文化生态,用新的文化主导权对资本纪文化进行修复。摩尔提倡用“抽象社会自然”的概念来表达资本/劳动关系之外的占用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与自然资源一样被无偿占用,其结果就是工人和公用资源被抽象社会自然化,从而加剧了生态的二元对立。他认为,资本主义文化修复必须以

解构二元对立为前提,在解放抽象社会自然的基础上实现价值观的解放,从而建立真正平等的生态文化。夏皮罗主张将“相对固定劳动力”与文化修复相关联,将黑奴、女性等这些抽象社会自然纳入历史建设的组成部分。相对固定劳动力是阶级主体性的重要生成要素,是造就阶级稳定和阶级隶属的主导文化或社会基础。比如将黑奴按等级定价就是社会自然抽象化的具体表现,这一现象的背后是被自然化的种族主义文化,这种被“平常化”的文化意识是奴隶买卖的意识帮凶。夏皮罗的观点为文化唯物主义找到了理想的研究对象,实现了社会再生产理论与文化主导权理论的有机结合,超越文化对经济基础非要素反映的简单化理论,为建立良性共栖的生态世界提供了文化保障。⁽²¹⁾¹²⁴

2. 共同栖居

在人类纪的话语逻辑下,生态政治的根基被动摇,现有的政治、经济和科技手段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难题。出于相同的忧虑,布鲁诺·拉图尔和摩尔都提出了共同栖居的文化理念。拉图尔认为,人类成功地从“冰冷、灰暗”的第一自然(穴居和政治认识论)中解脱开来,也尝试实践了“温暖、绿色”的第二自然观(成为生态思考者),但却在第三自然(成为生态自为者)面前碌碌无为。为此,拉图尔从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经济、政治和道德等外在因素着手,对当下的政治经济学趋势加以批判,认为不应该纠缠于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垂直区分,因为僵化的经济法则无法为生态政治提供鲜活的土壤,其结果只会让科学家和政治家都不知所措。拉图尔认为,理想的做法应该是将事实和价值在水平集合后在进行分层区分,由科学家构造出因果关系链,政治家厘清该应对的敌手,道德专家甄别出被排挤在外的对象,从而建构出更好的政治生态模型,并最终实现共同栖居。⁽²²⁾¹³²

对于共同栖居的理念,摩尔在2015年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共同栖居是人类与自然的双重内在性关系,是“创造性的、生成性的,是关于生命塑造、物种和自然的多层面的关系”。摩尔鼓励开展一场超越“绿色计算”的辩论,即关于生态历史的各种二元论,包括人类和自然、资本主义和自然等。他将矛头直指当今世界依然存在的形形色色的暴力、不平等和压迫现象,认为在这些具体现象的背后,是难以尽数的超然物外的人类存在。人类不仅将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为历史和现实中的毁灭行

为的合理化背书,甚至还将自身的某些特定群体也排除在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之外。

结 语

生态批评的资本转向是对人类纪逻辑下生态治理失效反思的结果。资本主义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资本主义“因危机而繁荣,危机是其‘创新和创造’的引擎”⁽²³⁾¹⁸,人力危机和生态危机是其利润的充分保障。解析资本纪话语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入手,通过对笛卡尔以来的人类/自然二元论的解构,在解放抽象社会自然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生态平等,以此来改变强权资本杜撰的生态历史。另一方面,在面临第六次生态大灭绝的当下,资本纪话语的研究者们希望通过文化修复来缩小资本主义和环境危机之间的裂隙,从而实现他们所向往的共同栖居的理想。然而,由于危机和破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石,它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制造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只要这一社会制度不消除,环境问题就不会有终极的解决方案。所以,一定意义上讲,文化修复仅仅是资本主义环境矛盾的调和剂,因为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生态问题。

参考文献

- (1)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M]. London: Penguin, 1975.
- (2) J. Zalasiewicz et al. The New World of the Anthropocene[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0(7): 2228-2231.
- (3) Jason Moore. 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e: Nature,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M]. Oakland: PM Press, 2016.
- (4) Donna Haraway. When Species Meet[M]. Minnesota: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 (5) Henry Thoreau. 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M]. New York: First Vintage Books, 1991.
- (6) Tom Cohen. Polemos 'I am at war with myself' or, Deconstruction in the Anthropocene[J]. The Oxford Literary Review, 2012(2): 239-257.
- (7) Giorgio Agamben.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8) Timothy Clark. The Anthropocene As a Threshold Concept[M]. London: Bloomsbury, 2015.

- (9) Slavoj Žižek,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M]. London: Verso, 2010.
- (10) Walter Johnson. *Slavery and Empire in the Cotton Kingdom* [M]. Cambridge: Harvard UP, 2013.
- (11)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M].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7.
- (12) Paul Crutzen. *Geology of Mankind: The Anthropocene* [J]. *Nature*, 2002(415): 23.
- (13) Karl Marx. *Capital*, vol. 3 [M]. New York: Pelican, 1981.
- (14) Jason Moore. *Cheap Food & Bad Money: Food, Frontiers, and Financialization in the Rise and Demise of Neoliberalism* [J]. *Review* 2012 (2): 125 – 161.
- (15)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M]. New York: Vintage, 1977.
- (16) B. Allenby & D. Sarewitz. *The Techno – Human Condition* [M]. Cambridge: MIT Press, 2011.
- (17)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M]. New York: Schocken, 2007.
- (18) Bernard Stiegler. *Within the limits of capitalism, economizing means taking care* [C]// T. Cohen. *Telemorphosis: Theory in the Era of Climate Change*. Ann Arbor: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2: 102 – 120.
- (19) 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M]. 赵一凡, 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9.
- (20) James Speth. *Capitalism, Environment, and Crossing from Crisis to Sustainability* [M]. New Haven: Yale UP, 2009.
- (21) Stephen Shapiro. *From Capitalist to Communist Abstractions: The Pale King's Cultural Fix* [J]. *Textual Practice* 2014 (7): 1249 – 1271.
- (22) Bruno Latour. *Politics of Nature: How to Bring the Sciences Into Democracy* [M]. Trans Catherine Porter. Cambridge: Harvard UP, 2004.
- (23) Sian Sullivan. *Green capitalism and the cultural poverty of constructing nature as service provider* [J]. *Radical Anthropology*, 2009 (3): 18.

Telemorphosis and Cultural Fix: On the Capital Turn of Ecocriticism

CHEN Xiao – ming

(School of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As the result of double terminological abstractions, Anthropocene cannot overcome the self – deconstructive logical quandary of anthropocentrism, human exceptionalism and chauvinism. To replace it with capitalocene will help untie the knots of ecological problems naturalized in the deceiving and destructiv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Basing its discourse upon capitalism's telemorphosis, the capitalocene explores the dominant and recessive effects of its mode of production and seeks to rewrite the history twisted by capitalist power.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ecological crisis, the capitalocene seeks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capitalism and environmental woes and achieve its ideal of common dwelling.

Key words: capital turn; capitalocene; telemorphosis; cultural fix

(本文责任编辑: 董春雨)